中信出版社

叶永烈 著

历史在这里沉思

陈云书房“交流会”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游泳池成了“游书池”
- 我被当成“鞋店老板”
- 第一次投稿（1）
- 第一次投稿（2）
- 第一次投稿（3）
- 写诗“发烧友”（1）
- 写诗“发烧友”（2）
- 第一本书的故事（1）
- 第一本书的故事（2）
-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1）
-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2）
-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3）
-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1）
-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1）
-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2）
-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3）
-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4）
-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1）
-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2）
-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3）
-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4）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1）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2）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3）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4）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5）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6）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7）

-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8）

游泳池成了“游书池”

我的藏书太多，胜过一家普通的图书馆。

我看中现在所住的这套房子，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开发商送了一层顶层，上面有一个带屋顶的三十多平方米的私家游泳池。在上海市中心，拥有私家游泳池的房子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游泳池当时已经在底部和四壁铺着漂亮的蓝色瓷砖。入口处安装了台阶和白漆铁扶手，可以沿台阶走进游泳池。游泳池的一端，安装了高压水泵，可以迅速进水。另一端的出水口，在与游泳池相邻的阳台上，那阳台底部铺了厚厚的橡胶，以防排水时阳台渗水。在刚“进驻”的时候，我把进水口的高压水泵阀门打开，自来水涌了进来。一边进水，我和妻一边用尼龙丝扫帚在水中轻轻扫着，就把游泳池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这个游泳池，可以放水一米多深。

在洗净游泳池之后，我并没有用来游泳，而是把这个私家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朋友们戏称为“游书池”。这样，我除了有书房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室。

我把几万册藏书，存放在这个私家游泳池里。在我看来，既然这个游泳池可以承重一米多深的水，当然也就可以承受几万册藏书的重量。

把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在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之中，我大约可以算是惟一的一个。

我在这个藏书室里放了一张可以半躺的沙发，专供空余时读书之用。在搬家时，我把所有的书整理了一遍，发现在我的藏书之中，还有不少好书来不及读。我把这些书堆放在沙发旁的条几上，读过之后才放入书柜。

在游泳池里读书，成了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在那里，我大有“日坐书城”之感。沙发旁的条几上，放着墨水笔。看到有参考价值的内

容，我用笔做阅读记号，或者把那一页的页角折起来，便于日后查看。

我被当成“鞋店老板”

游泳池里原本空空如也。为了能够藏书，起初我买了十个两米高的现成的玻璃书橱，放在游泳池的北面和东面。这些玻璃书橱，每一个都有五层书架，底下还有一个柜子和两个抽屉。

为了使朝南的一面能够让阳光照进来，我定做了七个一米五高的书柜。我自己画了设计图纸，请家具公司按照我的图纸来做。

为了提高书橱的容书量，我密密麻麻地放两排书。放在后排的，是不常用的书；放在前排的，是常用的书，书脊露在外面，查找起来就要方便多了。

这十七个书橱沿着长方形的游泳池排列起来，呈“Π”形，放满了东、南、北三面。剩下的西墙，我安放了一个搬家时搬过来的四门大衣橱。

随着第三批图书运过来，很快的，这十七个书橱即便是放两排书，也放不下了。

为了安放我的大批样书和一些重要的参考书，我在新居的大小两个书房里，又定做了六个大型玻璃书橱以及五个书架。此外，在书房和阳台上，还安放了二十来个铁文件柜，放满了书和资料。

这么多书橱和铁文件柜，还不够用。

为了挖掘潜力，我决定再定做十个书橱，分两排放在游泳池中央。

这一回，定做十个书橱，闹了个大笑话：

我把上次做过的书橱的图纸，给了另一个家具公司。我以为，反正上次已经做过，只要照图纸做，错不了。

当那个家具公司把书橱运来，却令我傻眼了：我曾精确计算过，按照图纸做，书橱里正好竖放一本大32开的书，可是，这一回做的书橱，却无法放进大32开的书，只能横放了！

为什么呢？因为家具公司擅自修改了图纸，给书橱装了脚，而高度不变，这样就使每一格的高度缩短了。

家具公司为什么不征询顾客意见就擅自修改图纸呢？

家具公司的老板的回答，语出惊人："我以为你是开鞋店的，定做鞋柜！"

他怎么会把我当成鞋店老板呢？

原来，此前有一位鞋店老板，曾经向他定做了一批鞋柜，式样跟我定做的柜子差不多。于是，家具公司老板就以为我也是开鞋店的。鞋柜是有脚的，所以他就做成有脚的。至于这么一来缩短了每一格柜的高度，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因为放鞋子嘛，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

家具公司老板来到我家的游泳池之后，看到有那么多的书柜，这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误。他自言自语道："我想不到，你定做的柜子是用来放书的。除了图书馆之外，谁家里会有那么多的书，会定做那么多的书柜？！"

怎么办呢？这位擅自修改图纸、想当然的家具公司老板，抓了抓头皮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擅自修改图纸。这样，我再做两个书柜送你，算是道歉吧！"

我答应了。对于我来说，反正书橱多多益善。就这样，游泳池中央的书橱增加到十二个。加上游泳池三面的十七个书橱，竟然安放了二十九个书橱。

从此，我在家中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城"。

第一次投稿（1）

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作家，这得从我十一岁时第一次投稿的故事说起。

我是温州人。温州——“温暖之州”，东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我的家在市中心。离我家不远处，是《浙南日报》社（今为《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有一只绿色的大木箱高挂着，上面写着“投稿箱”三个白色大字。我常常从那里经过。我不知道这“投稿箱”是什么意思。听别人说，只要把稿子投进箱子，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登出来。我不由得心动了。每当我走过那只投稿箱前，那箱子仿佛在向我招手。

正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我，有一天忽地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写好以后，我踮起脚，把稿子悄悄地投入那只在我看来颇为神秘的箱子里。

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第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铁井栏29号，叶永烈小朋友收”，下方印着“浙南日报”四个红色大字。我至今珍藏着那个信封以及那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你的稿子收到了，已经读过，很好，我们要把它放在下一期报上（《人民生活》副刊）登出。登出以后，一定送一张当天的报纸给你，好不好？还有稿费。希望你以后多多写稿子寄给我们，我们十分欢迎。稿子写好后可以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或者你自己送来都好。你在什么学校读书？几年级？有空望多通信，把你自己的感想告诉我们。

祝

进步！

浙南日报社副刊组

1951年４月１６日

我看完这封信，心儿怦怦跳着。我真想去见见给我写信的人，可是，我年纪小，胆子小，不敢去，也不知道给我写信的，究竟是编辑叔叔、伯伯，还是编辑阿姨。我只看见信末盖着长方形的蓝色公章。我写了一封回信，回答了信中的问题。信，还是扔进那只神秘的大木箱。

十来天之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８日，我放学回家，我爸爸笑容可掬地叫唤我："阿烈，快来看报纸。"

啊，见报了!这首小诗总共只有七十个字，今天读来，就像见到自己小时候嘴里含着手指的照片一样。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是按照温州话押韵的，而且充满着当时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毕竟是我创作生涯的起点，也就不揣拙劣，照录于下：

短歌

十一岁小学生 叶永烈

全世界人民，
个个都知道：
美国法西斯，
武装两个贼；
要问它名字：
日本与西德。
大家一听到，
愤怒像火海。
举起大拳头，
愤怒变力量。
打败美国佬，
给他好教训：
咱们的祖国，
不能受威胁！

这首小诗，也就成了我的“处女作”。后来，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那入会表格上有一栏“何时开始发表作品”，我就写上“1951年4月28日”。这首小诗的发表，成为我一生创作的起点。

第一次投稿（2）

不久，我收到了九千元人民币稿费。这是我平生的第一笔稿费。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当时用的是人民币旧币。一万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如今的一元人民币。九千元人民币旧币，也就相当于今日的九角钱!

第一次投稿，就幸运地遇上一位热心的编辑，就顺利地发表在报纸上，这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第一次感受到写作的乐趣。经过自己的构思、创作，终于成为作品，终于发表。尽管只是一首小诗，尽管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幼稚。《浙南日报》编辑在刊发小诗时，注明“十一岁小学生”，这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鼓励创作；二是请读者不要苛求，这毕竟是一个孩子写的诗啊！

由于我的小诗的发表，在学校里成了“新闻人物”。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写作，于是，少先队办壁报、黑板报、油印小报之类的事，都落到我的头上。这对我是极好的锻炼。我居然“连升三级”——从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一下子升为大队宣传委员，佩上“三道杠”臂章。

就在我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后不久，我居然收到了《浙南日报》的约稿信。那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又一封印着《浙南日报》红字的信，寄到了我手中。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跟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前次给你的稿费收到了没有?“六一”儿童节到了，请你写写自己的感想寄给我们，好不好。

致

礼

《浙南日报》副刊组

稿子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收

我应约写了《纪念“六一”》一文，于1951年6月1日发表于《浙南日报》。这是我的第二篇见诸报纸的文章，全文如下:

纪念“六一”

市立九小 叶永烈

六一是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它呢? 我说:

一，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锻炼身体，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

二，参加游行、宣传工作，订出爱国公约，响应政府号召。

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快乐的日子谁带来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共产党、解放军、毛主席。

这篇短文如今看来同样非常幼稚，口号式，可毕竟是一个十一岁孩子当时的心声。

虽然我知道，在离我家不远的《浙南日报》社，有一位热忱的编辑老师在关心着我，扶植我。可是，我却不敢上那里去。

我曾这么说:“我不敢去见见那位编辑老师。我，一个在少先队小队会议上发言都会脸红的孩子，怎敢跨进报社的大门?何况我又不知道给我写信的人姓什么，万一传达室问我找谁，我怎么答得出来?”

那个年代，报社编辑给作者写信，在信末盖上个公章。我深深怀念着那位热心的、不知名的编辑。我精心收藏着那些信件和那些用铅字印出来的最初的作品。后来，我不论考上北京大学，还是由北京到上海工作，一直带着这些“珍品”，直至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

第一次投稿（3）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直到1980年，发还一大包抄家物资，我惊喜地发现，那些“珍品”居然完好无损!

我重新细阅那些珍贵的信件，抚今忆昔，不胜感慨。我始终感激那位我从未谋面的热心的编辑。

不久，正巧《温州日报》派记者来上海采访我。我说起《温州日报》当年对我的培养，怀念那位恩师，便将那封信复印，请《温州日报》的记者带回去，请编辑们辨认是谁的笔迹，帮助我寻师。

事隔将近三十年，报社里人员变动很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的更新，一茬又一茬，报社许多人不认识那位老编辑的笔迹。

复印件到了报社总编手里。总编在报社工作时间很长，认出了那笔迹。他说:“这是杨奔的字！”

杨奔，当年《浙南日报》的副刊，正是由他一人编辑。

从编辑部的来信中，我知道了关于他的大概情况:他16岁起就当小学、中学的教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他在《浙南日报》只工作了一年，由于政治上的冤屈，被调离报社，到一所中学去当语文教员，后来退休，住在温州远郊的苍南县。

根据报社提供的杨奔先生的通讯地址，我于1981年3 月10日，向他致函问候，感谢他在三十年前曾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伸出温暖的手。我写道:

“我非常感谢《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帮助和鼓励。我曾在《我的第一篇作品》一文中写道:‘如果不是在11岁时受到那位编辑的帮助，如果没有发表那篇不像样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子打一辈子交道。大树都是由幼苗成长起来的，幼苗的成长离不开园丁的辛勤培养。’这段话正是反映了我对《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深切感谢之情。……”

杨奔先生在收到我来信后，心潮起伏，当晚填词《小重山令》：

“上纸书来四座惊，忽疑身是梦，忆三生。起看落月半笼明，春寒重，辛叶暗藏莺。

少日若峥嵘，挥毫倾肝胆，照人清。滋兰九畹望敷荣，萧艾甚，独秀有灵茎。”

词中有喜悦，亦有慨叹。大意是：接到叶永烈的来信，喜出望外，四座皆惊。忽然感到仿佛置身梦境，从过去想到现在、未来。祖国迎来黎明，可惜一度春寒料峭。办报纸中包含培育人才。我年青时苦于做点不平凡的事，写作和改稿中反映了自己的内心，照亮别人。盼大地芬芳的花朵开花结果，可惜多蒿草，然而杰出人才一枝独秀。

不久，我收到了杨奔先生的来信。笔迹是那么熟悉，与30年前给我的信上的字一模一样。

出人意料的是，他对30年前的往事，看得很平淡。他自称不过是个“文学理发匠”罢了，对于发表我的小诗，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已!

杨奔先生感慨万千，在信中说起了往事:

“编副刊时，原想在温州能发掘些写作人材，培养出一支文艺新军，可是事与愿违，来稿寥寥，使我感到十分寂寞。收到你的诗稿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同时又因为自己也在你这年龄时有两篇文章被上海某书局收入范文集子，结果不但没有收到原书和稿费，而且连一封信也没有。这很伤了我的心。所以在自己干这工作时，就发愿不使自己愧疚，不使作者生气。对来稿只要略有可取之处，都立即给作者写了回信，让我安心并得到鼓舞。……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机，至于过高估计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

巧真巧，原来杨奔先生也是在十一岁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但是，那位编辑不负责任的作风，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种切身的痛楚，又从反面成了他对我的关心的动力。

杨奔先生在信中，还直言不讳地提醒我:

“高尔基的《回忆录。契诃夫》中记有契诃夫对当时艺苑的感叹:许多人略有成就便沾沾自喜而告终。鲁迅也说过:人没有被骂杀的，只有被捧杀的。你千万要警惕人家一片喝采声，它很易成为昏眩的毒药。”

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心仪已久的老师。

198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长子一起回到故乡温州，我们渡过三条江，赶到苍南县龙港镇。我终于见到了杨奔老师。老编辑和当年的小作者见面，喜悦异常。

我对杨奔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神交三十六载，今日第一次见面”。

杨奔先生已经白发苍苍，虽已退休，仍笔耕不缀，出版新著《外国小品精选》、《苍南历史人物》，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后——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从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温州平阳张家堡探望，然后前去苍南看望杨奔先生。杨奔先生由于夫人故世，已从龙港镇搬到灵溪镇女儿家居住。这一回和杨奔先生见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缘分”：

我的妻子姓杨，乃温州平阳县张家堡人氏，而杨奔先生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从妻子的祖屋后门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里人告诉我，那里就是杨奔先生的旧居！我的岳父杨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中藏书甚丰。杨奔先生年轻时，常到我岳父的书房里小坐，并且向我岳父借书。我走访村里的杨氏宗祠，从杨氏家谱中查出，杨奔与我妻子家还是亲戚呢。按照家谱排辈，我应是杨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

当我见了杨奔先生，说起我们之间的这段奇特的缘份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县志里要收入我岳父的小传，这小传由杨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岁时发生的这段故事，不仅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将以写作为业，而且竟为十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带来奇特的缘分！

写诗“发烧友”（1）

猛然，听见一声“呜”的尖叫，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驶过来。我扔下手中的行李，奔了过去，瞠目注视着那蒸汽机车……

那是在1957年，十七岁的我，头一回离开温暖的家，温暖的故乡——温州，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从金华转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候的长途汽车不是用汽油，而是烧木炭的。汽车背着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里烧着木炭。一边是清清的瓯江，一边是陡峭的山崖，长途汽车在崎岖的黄泥公路上艰难前进。

我从未见过火车，一到金华，头一回见到那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时间兴奋无比。

就这样，在无限兴奋之中，我在金华乘火车，远涉千里，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

兴奋很快就过去，接踵而至的便是想家。四周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地方是陌生的，就连那饭菜也是陌生的……特别是一进校门，便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投入“反右派运动”。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批斗会，从未见过大字报，从未领略过那政治暴风雨。我日夜思念着海滨那座温暖的小城，思念着那个温暖的家。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OOO北京大学OO斋OO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离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学业很忙，从早到晚，时间表上塞得满满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宿舍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我留下来了，留在那空无一人的宿舍。因为我的家远离北京，由于父兄蒙冤，原本很宽裕的家庭经济变得异常拮据，我靠着助学金能够念大学已经很不错了，而回家简直是幻想和奢望——虽说学生那时只用买半票，可是我连半票都买不起!

写诗“发烧友”（2）

空荡荡的宿舍，空荡荡的心。“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唐朝大诗人李白《太原早秋》中的诗句，成了当时的我的写照。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排遣那作为异乡异客的可怕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我埋头于写作!

那时的我，成了写诗“发烧友”。我的衣袋里，总是放着小本本。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一有“灵感”，就赶紧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看见飞鸟，看见小草，看见日出，看见落叶，都会激起我的诗情。

虽说进入北大之后，我读的是化学系，可是我却加入了中文系的“红楼诗社”。在那些“发烧”的日子里，我竟写了一千多首诗。

我不断地给各报纸、杂志投稿。我的小诗，绝大部分如飞雪入水，不见踪影，可是也有时偶然溅起了涟漪，发表了。我的小诗不仅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也上了《北京日报》、《湖南文学》之类“大报刊”。

那时，我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写出了《好样的“保姆”》一诗，先在工地广播站广播，不久在1958年5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女同学组成了“赵一曼连”，在十三陵工地紧张的劳动之余，还帮助民工看孩子，获得好评。

她自己还是个大孩子，
却把看孩子的任务担负。
心里既喜悦又谨慎，
嘴里哼着刚学会的催眠歌。
孩子随着绵绵的歌声熟睡了，
扁平的鼻子上渗着汗珠。
“他在做什么梦呀?
啊!一定是梦见自己也在修水库。”

正在替大伙煮饭的老大娘，

望着她不住地啧啧点头:

“这那里像大学生哪?

简直是好样的保姆。”

1958年，我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跟随地质队在湖南跋山涉水。一路走，一路写，一百天内我写了四十六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发表在当时湖南报刊和《湖南文学》上。

在湖南邵阳，有一位青年爱唱山歌。他唱，我记，收集了许多湖南民歌。迄今，我还能唱出湖南山歌:

今年哎，

我将一十七啷呵，

收拾打扮去看戏，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情郎我的哥，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斗胆把我收集到的湖南民歌和自己写的许多小诗，编成一本诗集，书名叫《湖南民歌选》，在1959年初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退稿是必然的。但是，编辑在回信中写了许多鼓励的话，算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湖南民歌选》是我没有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迄今仍珍藏着这第一本书的手稿。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敢”于写书，其实是受了北京大学学生写书的热潮影响。

始作俑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在1958年“大跃进”中，“敢想敢干”，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得以出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产生很大的震动。

于是，化学系的学生们也不甘示弱，组织编写《稀有元素化学》一书。我也参加了编写，写了关于钍的一章。尽管这本学生们所写的

《稀有元素化学》一书由于质量太差，未能出版，但是毕竟使我经受了一次写作锻炼。

接着，在1959年，我写出了《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这本书，严格地说，我只是编写而已。当时，我看了许多科学杂志，对诸多科学珍闻发生兴趣，内中不少是当时科学的最新成就，加以摘写，编写成了这本《科学珍闻三百条》。

我把《科学珍闻三百条》投寄给河北人民出版社，又遭到退稿。

不过，编写《科学珍闻三百条》如同“无心插柳”，倒是为我在1961年创作科幻小说《小灵通奇遇记》（即《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初稿）作了准备，这是后话。

凡事有三：

第一本书《湖南民歌选》，我只是收集，只是编（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作的），被退稿；

第二本书《科学珍闻三百条》，我也只是收集，只是编写，被退稿；

吸取了前两本书失败的教训，在1959年，我写出了第三本书《碳的一家》。这本书不是编，也不是编写，而是我创作的作品，所写的又正是我自己的化学专业。这本书成功了，顺利得以出版，成为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实现了“0的突破”。

第一本书的故事（1）

1996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发表了读者詹祥林先生的《真想叶永烈重操旧业》一文。他在文章中说:

与许多爱读书的人不一样，我很早的时候——从初中开始，就不大读小说而对科普书籍感兴趣了。

我读小学时，正是书荒年代，使我开始喜欢上科普读物，是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但书中讲的道理又由不得你不相信。它说，金刚石、石墨、煤炭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也就是说无论高贵至尊的金刚石，还是廉价低贱的石墨煤炭，它们的“血统”都一样，其基本成分是一样的。为什么性质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晶体结构不相同。比方，金刚石的碳原子是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构成了一种坚实的、彼此联结的空间网状晶体。而石墨的晶体是层状结构，在每一层内，碳原子排列成六边形，一个个六边形排列成平面的网状结构，因片层之间容易滑动，故石墨质软。经过一定的高温高压，普通的碳便能变成珍贵的金刚石。

这本书不仅诱发了我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还影响了我以后的爱好。读高中时化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课，甚至还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

后来这本书被人借走并弄丢了，我感到很惋惜很心痛，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和它的作者。

1976年，我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我顿感亲切和激动，拿出来一看，果然是那本朝思暮想的书!从此，我不但知道了书名，而且知道了它的作者叫叶永烈，并知道叶先生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居上海，是专门从事科普创作的名家，是继高士其之后中国有名的科普高手，六十年代就驰名中国。总之，叶先生成了我的偶像，我的崇拜者和指路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后，叶先生鲜有科普作品发表，多见的是他写的人物传记和纪实作品。叶先生已改行了！我很遗憾，中国并不缺写家，然而极缺既具有深厚专业功底又会写作的科普作家。去年中国科协开大会时发出呼吁，要科学家们拿起笔来写科普作品，教育和影响青少年们爱科学、学科学。这是时代的呼唤呀!我真想叶先生重操旧业。

詹林祥先生在文章中提及的《碳的一家》，是我平生第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1959年写的，当时我十九岁。

这本书的初版本，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只有四万字，是一本小册子。丁深、刘开申等绘图，张之凡装帧，责任编辑为曹燕芳。初版印了两万册。詹林祥先生最初读到的“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这本“薄书”就是《碳的一家》1960年的初版本。

第一本书的故事（2）

在“文化大革命”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第二版，字数增加到九万。第二版印了二十万册。詹林祥先生“1976年，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便是《碳的一家》的第二版本。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碳的一家》蒙文版，译者为那木拉、巴达玛苏荣。

在1987年9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第三版，字数增加到十三万。

这本小书居然“诱发”了詹先生“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甚至还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一本小书，能够产生这样大的作用，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这本书写于1959年暑假。当时，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刚念完二年级。由于在暑假中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不再在图书馆写作，而是在北京大学二十八斋二三四室宿舍写作。我花了一个暑假，写出了五十多篇科学小品。

记得，在开学那天——9月1日，我逛北京大学附近的海淀区新华书店，见到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塑料的一家》，也就买了下来。这本小书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因为我在暑假中所写的许多化学小品，大都是关于有机化学的，而有机化学的“主角”是碳元素。于是，我忽然有了“灵感”：何不把那十几篇化学小品，编成一本《碳的故事》？

就这样，我从暑假中所写的科学小品中选出十四篇与“碳”有关的，作修改和补充。

我从9月1日开始重写那些化学小品，花了半个来月时间完成，投寄给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本书的初稿，是写在活页横格纸上的。至今，我仍保存着。写好初稿后，誊在方格稿纸上，于1959年9月中旬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名《碳的故事》。

迄今，我仍保存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那是铅印的《收稿通知》。上面写着

收 稿 通 知

收稿编号:(59)30286

稿名:《碳的一家》

收稿日期:9，24

著编译者:叶永烈

附件:信二，图十七张，小品文一册

亲爱的作者同志:

一，稿已收到，上表如有错误，请即来信告知。

二，你的稿子我们即按收稿先后进行审读，约在10月下旬可把处理意见告诉你。

三，如果查询稿件或更改地址，请注明收稿编号(见上角)，以便我们处理你的

来信。

此致

敬礼!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年9月25日

就这样，我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了联系。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幼稚的第一本书，落在编辑曹燕芳手中。她当时是一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编辑，还梳着辫子。她热情地首肯了我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这样，我在10月13日就收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审稿意见，在10月14日至20日，对全书作了修改、增补，书名也从《碳的故事》改为《碳的一家》。

此后，我与曹燕芳有了诸多联系，得到她的许多帮助。直到今日，尽管曹燕芳年已八旬，我有空总去看望她。

1960年2月，我平生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茅盾在《1960年的儿童文学》一文中，曾提及这本《碳的一家》，称之为“一本科学小品集”。

如今，当我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觉得有几点十分可贵的地方：

一是编辑热心扶植新作者——写《碳的一家》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既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很深的“资历”。现在我重读原稿，发现有不少不合标准的简体字，如“气”写作“氿”，“数”写作“由”旁“攵”，“兴”写作“丑”下加“八”……还有许多错别字，如“年轻”写作“年青”等等。像这样幼稚的作品，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领导以及该书责任编辑曹燕芳的热情肯定，居然决定采用。

曹燕芳写来很长的信，提出中肯的意见，指点我如何修改。我于1959年10月中旬重写了一稿。如果没有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很难得以出版。

二是审稿迅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收稿通知”是1959年9月25日寄出。也就是收到稿件的第二天，就发信给作者了。信中说，“约在10月下旬可把处理意见告诉你”。实际上，他们审稿意见提前告诉了我。这使我不由得想起现在不少杂志这样公开声明：“因人手少，本刊概不退稿，三个月内未收到刊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也有的出版社，作者把书稿寄去，一年半载不见回音。这与当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作风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

三是出版周期短——这本书是在10月中旬才完成修改稿，然而，翌年2月就出版了。也就是说，从审稿、画插图、封面、排字、校对(包括寄作者校对)、付印到出书，只四个多月!那时候是用铅字排印，不像现在用电脑写作，有电子文本，作者等于给出版社排好字，所以在用铅字排印的条件下能够四个月出书，确实不易。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1）

我的幸运还不只是在于第一本书《碳的一家》顺利、迅速出版，而且还因此成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真是机缘凑巧，由于《碳的一家》文笔活泼，我竟然因此被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了！

当时，曹燕芳正在编《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责任编辑。她看中了我，邀请我参加写作《十万个为什么》——这就是远在北京的我参加上海《十万个为什么》写作的缘由。

我记得，曹燕芳给我寄来一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要我试着写几个。

我写了五个“为什么”寄去，曹燕芳一面热情地给予肯定，一面指出不足之处，然后要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就像学生答题似的，按照那张清单所列的“为什么”一个个写下去。每写好十几个，就给他们寄去。他们看毕，又随时告知意见。就这样，我竟一口气为化学分册写了一百多个“为什么”。也有的“为什么”是清单上所没有的，我也就自己提出“为什么”，自己回答“为什么”。

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辑部的“内幕”。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寄那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时，其实每一个“为什么”都已经有稿子了。他们组织好多位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写好了化学分册。由于化学老师们写的“为什么”像教科书，曹燕芳不满意，找我重写。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内幕”，也就一个个写下去。编辑部后来大批采用了我的稿子，为此得罪了一批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

《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初版本共收175个为什么，我写了163个——只有12个“为什么”是别人写的。

接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约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其他分册撰稿，即天文气象分册、农业分册、生理卫生分册。编辑潘勋照、洪祖年、张伯文向我约稿，我又为这些分册撰稿。我为天文气象分册写了27篇；为农业分册写了89篇；为生理卫生分册写了43篇。

我是初版本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初版本最初出五卷，共947个“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也是这套书最年轻的一个作者——写这套书时我只二十岁，出书时我只二十一岁。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为什么”，“逼”着我看了大量的参考书。好在北京大学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另外，在写作时，我注意每一篇的写作手法有所不同，这样使我的写作技巧得到了迅速提高。

我常说：“要喝一杯水，就得挑一缸水。”为了写好一篇“为什么”，往往要查看好几本以至十多本参考书。写了那三百多篇“为什么”，使我的知识范围迅速扩大，织出了一张张横跨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知识之网。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2）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不是像现在版本那样在每篇末署作者名字，而是按写作多少为序，在书前署名。由于我是化学分册和农业分册写得最多的作者，所以在这两册初版本上，我的名字都是排在第一个。

我小小年纪，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委以重任，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开国元勋”……那时的我，跟读者的年龄相差并不大。正因为这样，如今很多四、五十岁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老读者见到我，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该是个“老爷爷”了——连《十万个为什么》都已四十多“岁”了嘛!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另一“内幕”，是我在前些年跟已经退休了的曹燕芳闲聊时，这才知道的：

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是按篇算的，每篇十元，而给我却是每篇五元!为什么我的稿费比别人低了一半?

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是十分荒唐的。据说，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稿费给多了不好，以免出“第二个刘绍棠”! 刘绍棠是中国的“神童作家”，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语文课本里就印着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在1957年，刘绍棠被打成“右派分子”。

就这样，这部迄今印了两亿一千万册的书，我只在初版时拿到过每篇五元的稿费(后来在1980年、1999年修订再版时发过一回按篇计算的稿费)。台湾作家来访时，知道我是《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以为稿费不少，经我说明后颇为惊讶。因为如果在台湾按版税制计算，印了两亿多册的书的版税，作者一辈子都用不光!

少年儿童出版社酝酿出版《十万个为什么》，是在1959年。

我注意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一册的编著者名单中，都有“山边石”其人。后来一打听，原来“山边石”是“三编室”的谐音。《十万个为什么》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编辑的。当时的第

三编辑室主任是王国忠。他由于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后来升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上海出版局局长。

2000年1月15日，我曾经请王国忠回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经过。

据他回忆：1958年“大跃进”时，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的数量“大跃进”，比往年增加了许多，但是质量大幅度下降。这样，在1959年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少年儿童出版社竟然拿不出像样的书。于是，决心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出点有质量的书。编辑们在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爱问“为什么”，从1959年年底开始，便准备着手编一套问答式的大型自然科学丛书。

王国忠说，当时，受苏联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也受《科学画报》的“为什么”专栏的启发。

我说，早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自然科学知识问答》，有点类似《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分子”的葛佩琦。我曾经访问过葛佩琦，他说他原本是学物理的。我也看到过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出版过一本墨绿色封面的小书，书名《一百个为什么》。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3）

王国忠说，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他设想出版一本类似于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但各篇是独立的科学小品。

当时为了给这套书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编辑们想出二十几个书名，写在第三编辑室的黑板上。最后，大家不约而同选中了《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

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名，取自英国诗人吉百龄的诗句：

五千个在哪儿，

七千个怎么样，

十万个为什么。

吉百龄，又译为吉卜林。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诗人，19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百龄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是艺术学校的校长、艺术家，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馆长。在印度的经历，使吉百龄熟悉印度的自然风光和民间传说。后来，他移居美国，开始发表关于印度的《丛林之书》、《丛林之书续集》等作品。

伊林从吉百龄的诗句中，选用《十万个为什么》作书名——尽管书里的为什么并没有“十万个”。在俄语中，“十万”——“一百个千”，用来形容多。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小书，大约只有五万多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套丛书。

《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组共五人，即曹燕芳、黄廷元、张伯文、洪祖年、潘勋照。其中主要是曹燕芳，一个人负责数、理、化三册。其余几位在当时是新手。

在编辑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最初请了一批中学教师撰稿，那些“为什么”写得像教科书，枯燥干巴。于是，编辑们只得推倒重来，物色文笔生动的作者……

王国忠对我说：

“你的第一本书稿《碳的一家》，属于化学，所以是由曹燕芳看的。她看了以后，认为不错。她交给我。我也以为文笔很好，就决定采用。问了一下，才知道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自从《碳的一家》出版之后，就看中了你，又约你参加写《科学技术新成就》、《农业科学新成就》以及《揭开科学之谜》等书。同时还约你写《十万个为什么》。你写了化学分册。接着，又约你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分册。”

我手头有《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版本，上面标明的第一次印数并不多，五千册而已。这表明，《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之初，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

要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第一次印刷就印了两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五册，从1961年4月开始发行，与广大读者一见面，当即引起轰动效应，成为畅销书，连连加印！

《人民日报》发表陈原先生的书评，指出：

“近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讲的是通俗科技知识。书凡五卷，不胫而走，可知人们多么想获得更多的科学常识了。”

陈原用“不胫而走”四个字来形容《十万个为什么》的畅销，《解放日报》则以书店里“踊跃购买”、图书馆里“出借一空”来形容这套书如何受人欢迎。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各省、市出版社租型翻印，成为当时印刷量最大的畅销书。初版本在短短的两三年间，竟然印行了五百八十多万册！

幸亏当时还没有盗版。不然，《十万个为什么》的盗版本定然充斥市场。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能够一炮打响?

这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题目林林总总，来自生活和生产，来自读者身边，读之十分亲切；内容广泛，无所不谈；每篇文章短小精悍，说古道今，趣味盎然。这套书以“大众化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为特色，受到读者欢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是，由于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所以青年读者以至成年人也喜欢这套书。这样，使《十万个为什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还在于“套”字上。《十万个为什么》在策划初版时，就注意到成龙配套的问题。初版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五册。后来，增加了数学、地质地理、动物三册。1962年12月出齐八册。这时，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收1484个“为什么”，105万字。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1）

1962年1月19日，上海《新民晚报》第二版发表记者永义所写的报道《图书的背后》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

“作者们对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专业知识是精通的，但写法上不一定符合儿童的特点。编辑部就再三讲明要求，多方协助作者。如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编辑部派专人和他谈，帮他修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这位作者一个人就 一百多个题目，成为本书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个。”

报道中提及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就是我。报道中提及的“这位作者一个人就写了100多个题目”，仅指化学分册，而不是全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诸于报道。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自从《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以后，我几乎很少主动向报刊投稿了，因为很多报刊编辑部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知道了我，纷纷向我约稿。我应付约稿已经忙不过来了。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重要报刊上。我还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我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和《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为了写《十万个为什么》，我曾生了一场大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当时，提出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像金字塔那样，底座很大，在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上“拔尖”。我入学时还是五年制，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型”的底座。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够重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的“学余创作”。沉重的功课加上繁重的写作，我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况且那时正值“三年自然

灾害”期间，我连饭都吃不饱。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黄豆，算是“改善生活”了。就连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京大学那天，学生们伙食得以改善，也不过是每人增加一个水煮鸡蛋而已！

我差一点累垮了。我的体质不错，平常很少生病，以病历卡上保持空白为荣。可是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有一回我突然连续发起高烧来，不得不住进北京大学医院。经诊断，我患急性肺炎。一星期后出院，仍咳嗽不已。经医生透视，我因肺炎引发了肺结核。

记得，医生劝我退学休养。我仍坚持上学。我住进了北京大学传染病“隔离”宿舍，那里住着肺结核与肝炎患者。每天清早和病友们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傍晚则做气功。吃饭在专门的隔离食堂，售菜窗口上方分别写着“肺”与“肝”字，意即供肺结核以及肝炎患者的专用。

所幸那时《十万个为什么》已写得差不多。在初版五册出版后，写后面三册时，我就不参与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当我开始恋爱，第一次送给我的爱人的珍贵礼物，便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当我打算从科学研究所“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十万个为什么》帮了大忙：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当来到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接待我的是厂长李资清。李厂长一听说我叫叶永烈，马上就说：“久闻大名——《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我们厂正在把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绍信”了。非常顺利，不久，我就调到了这家电影厂，在那里一口气干了十八年的电影编导工作。

顺便提一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工农兵批判联络站”的所谓“批判”。

内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我在化学分册初版本中所写的“做豆腐为什么要点卤?”。我在一开头，这么写道：“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可是你如果注意一下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情形，你会发现：人们总是用水把黄豆浸胀，磨成豆浆，然后进行‘点卤’——往豆浆里加入盐卤……”

这一段话，被“上纲上线”，扣上了“污蔑贫下中农”的政治帽子。

其实，那是因为我所看的电影《白毛女》是最初的版本。后来，《白毛女》进行了修改，把杨白劳写成挺身反抗黄世仁，不再是喝盐卤自杀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在“棉花为什么能作炸药?”一文中，说到“经过化学处理，斯斯文文的棉花，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助手，成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被“批判”为“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至于“太阳为什么有黑子？”一文，则被说成“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很大，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也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之一。

如此这般荒唐的“批判”，乃是那荒唐岁月的“拿手好戏”。所谓“工农兵批判《十万个为什么》”，大体上就是这等“水平”!

在上海工作的我，首当其冲。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记得，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家门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都在议论着我这“大毒草”作者……我被“下放”到杭州湾畔的“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在那里，我遇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他们也被送来“改造”。因为我们都是“臭老九”，都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五版（新世纪版）出版的时候，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之邀，为《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举行全国性的签名售书。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作为

《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沈阳、成都、济南、西安九大城市举行规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使我整天处于飞来飞去的状态。我破例答应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要求，为《十万个为什么》签名售书，是因为我毕竟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着四十年的友谊，我平生第一本书就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多年来，我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诸多帮助。正因为这样，少年儿童出版社打出“王牌”——请我的恩师曹燕芳打电话给我，要我无论如何答应下来，我只得从命了。

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了认真的策划。每到一地，总是在当地最大的新华书店、书城、购书中心拉上红色大横幅，门口挂上彩色大气球，播音员在现场不断地进行鼓动性广播，报社、电视台、电台记者进行现场采访，读者排起了长龙……每一回签名售书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签名售书确实是一项有力的促销手段。在上海，《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签名售书，读者排队长达两公里！在深圳书城，读者的队伍从二楼一直延伸到底楼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在西安市中心钟楼旁“世纪金花”广场，我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签售了近五百套《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相当于六千来册，总码洋达八万多元人民币。这在收入并不太高的西北地区，是难得的销售记录。

在短短四个多月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销售了三十万套，即三百六十万册，总码洋达五千多万人民币！虽然与过去发行一亿册相比，这印数不算很多，但是就当时中国图书市场而言，已经是超级畅销书了。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1）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与《十万个为什么》并驾齐驱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

写《十万个为什么》时，我20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时，我21岁。《十万个为什么》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两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正因为这样，有人笑称我是“三亿精神富翁”。

跟《十万个为什么》一帆风顺相比，《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命运则是坎坷崎岖。

我是在写完《十万个为什么》的翌年，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当时虽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并不满足，以为《十万个为什么》是由一篇篇一、两千字的“为什么”短文所组成，我希望向前迈进一步，写更长更大的作品，从科学小品迈进到科学幻想小说。于是，我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稿的书名叫《小灵通的奇遇》。

在写作《小灵通的奇遇》前，1959年初，19岁的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上二年级，写了一本书稿《科学珍闻三百条》。当时，我刚刚走上创作道路，缺乏写作经验，从各报刊及国外杂志中收集了许多科技新成就，共三百条，编成了《科学珍闻三百条》。这本书罗列科技新闻，太枯燥，太乏味，当然遭到退稿。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之中使我熟悉了许多当时的科技新成就、新动态，其中有工业、农业方面，也有医药、交通、通信、宇宙航行等方面的，这为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打下了基础。

由于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在完成《十万个为什么》之后，为了克服《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的缺点，我决定把它写成一本科学幻想小说。我通过一位眼明耳灵、消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进行一番漫游，报导种

种未来的新科学、新技术。这样一来，抓住了一根贯串线，把那些一条条孤立的科学珍闻，像一粒粒珍珠用一根线串了起来。另外，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写。1961年秋，我写出了《小灵通的奇遇》一书。

出乎意料，《小灵通的奇遇》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却遭到了退稿。在当时，我想不通，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比《十万个为什么》写得更好。后来才渐渐明白，那时候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之中，正处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中，这样描画未来美好图景、西瓜有桌子那么大的“奇遇记”，不合“时宜”，遭到了退稿。

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本书更加没有希望出版，我也就把它压在箱底，渐渐淡忘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遭到抄家。在抄家时，《小灵通的奇遇》手稿正放在岳母床下的纸箱里，岳母说那箱子是她的，手稿免遭厄运，得以保存。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2）

浩劫终于过去。1977年10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在出版社附近的长宁区第一中心小学里体验生活，约我给小学生们上一堂科学知识课。讲什么好呢?他们征求了小朋友们的意见，一致要我讲《展望2000年》。

我冒昧地答应了下来，去讲了一课。想不到，第二天消息传开，有四个小学派代表来要我去讲；第三天、第四天，几十个中、小学要我去讲。后来，甚至连无线电厂、公安局消防队、图书馆都要我去讲，讲的题目都是一个——《展望2000年》。

我忙于本职工作，不能一一去讲，只好请他们放录音。然而，我的脑海中久久地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对“2000年”那么关心，那么富有兴趣呢?一位老师对我说：“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很想具体地知道未来是怎样美好。孩子们是未来的建设者，他们就更加强烈地响往未来，关心未来。”还有的老师建议我把讲课的内容写出来，写成一本书。

没多久，我收到少年儿童出版社戴洋藩先生的一封来信。戴洋藩是《小朋友》杂志的编辑，与我相识多年。他的这封信，是受他的妻子、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沙孝惠之托写的，当时我并不认识沙孝惠。至今，我仍保存着这封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我社拟加强中年级科技读物，现由沙孝惠同志负责。她拟搞一本《在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展望祖国在2000年时工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新成就。我们觉得，这个题目由您来做较适合，沙孝惠同志希望能和您当面谈谈，时间由您决定，因据说难以找到您，是否可请您打个电话给她。电话：525762。她与张晋华同志在同一编辑组。

沙孝惠同志因初次搞科技读物，工作不熟悉，请多加指教。

握手！

戴洋藩

1977，12，11

正是由于戴洋藩的这封“介绍信”，促成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

沙孝惠约我写《在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使我记起了十几年前写的《小灵通的奇遇》，那本书就是讲“未来是什么样?”的。

感谢科学春天的到来，这颗被遗弃多年的种子终于萌发了。我把那发黄的书稿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立即得到领导和责任编辑沙孝惠的热情肯定。他们建议把书名改为《小灵通漫游未来》，压缩头、尾，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于是，我重新写了一稿。责任编辑沙孝惠认真编辑，画家杜建国画出了生动活泼的插图，画家简毅设计了精美的封面。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帮助下，这本书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印好，与广大小读者见面了，算是部分回答了小读者关于“未来什么样”的问题。

《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本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全书不过七万字。这本小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3）

《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了“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不光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大量印制，多次重印，许多省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纷纷租型印刷（如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年4月租型重印；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租型重印；另外，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2月出版套色精装本），使这本书一下子印了一百五十万册，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这本书还被改编成四种版本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连环画的总印数也达到一百五十万册。所以，《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总印数，达到了三百万册。

记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张叙生先生告诉我，1979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他前往书店参加售书。在短短的半天之中，这家书店一下子卖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五千册！

记得，那时我出差北京，路过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见到许多人排队。我细细一看，原来是在买《小灵通漫游未来》！

《小灵通漫游未来》获得了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记得，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大会便是由“小灵通”和白雪公主共同主持的。

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收到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在这里，我选录一封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来信，这封信是模仿书中“小灵通”的口气写成的：亲爱的编辑大朋友：

您好!

我看了叔叔阿姨们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真想看看真的未来市，请您帮我找一找小灵通。如果小灵通又去采访了，就不必找了。我找他的事是，叫他到我们家来，带我到未来市走一趟。我们家的地址是辽宁省沈阳市东北设计院七栋三楼向左拐。要是小灵通没有去采访，那么就叫他来，来的时候是夏天早晨八点四十分。要是找不

到，就找五经五校一年二班孙燕。您能不能给我编一些故事书，科学幻想故事书，未来的故事书。

有事请回信。

孙 燕

1979年2月29日星期一1978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徐明寿写的评论《生动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喜读〈小灵通漫游未来〉》。

《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当时也引起香港读者的注意。1979年7月1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唐琼的《谈叶永烈》一文，谈到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并对我的科幻小说创作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叶永烈，一个为青少年喜爱的科学普及读物作家，在成人中间的知名度差些，在国外恐怕就更差。然而，这是值得注意的人才，应该予以嘉勉。他曾荣获北京文化部和全国科技协会颁发的奖状。

特别可喜的是，他今年才三十九岁。“科学幻想小说之父”法国儒勒.凡尔纳，开始写科学幻想小说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叶永烈是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十九岁开始写科普作品，近二十年来已写了四十多本小册子，报纸上发表了五百多篇科学小品、科学相声、科学诗。去年一年就写了八本书，包括《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学幻想小说，拥有众多的小读者。他目前在上海。《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猜想是受到意大利作品《洋葱头历险记》的启发。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4）

我不认识这位勤劳的、相当有才华的中年作家，但是我愿向他提一个建议。

要叶永烈集中精力专门写科学幻想小说。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威力的普及手段。一百年前，凡尔纳作品在美国报纸上连载时，连大发明家爱迪生都为之入迷，甚至跃跃欲试，拉着一位青年作家(霍桑的女婿)合作，也想写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小说《封神榜》与《西游记》有极妙的幻想，是神话，但不是科学。如何吸取凡尔纳以来外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之长， 写出有民族风格的作品来，这是一个急待填补的空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部我们的第一流作品。这方面人才极其难得，因为科学幻想小说，不是数学上的科学“加”文学，而是要从化学上理解的科学与文学的“化合”。何况，这幻想还要经得起科学上的考验。

凡尔纳留下巨大的作品宝藏，我们二十年来只翻译了八本，约占十分之一。为了直接从凡尔纳以及其他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近年又兴旺起来)直接吸收营养，我建议叶永烈掌握法文，假如他还没有学过的话，至少能读英译本。还有，他的科普作品不可满足于数量，要对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同当代第一流外国科学幻想小说家相抗衡，必须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

《诗刊》1979年第8期，发表了诗人王尔碑的就《小灵通漫游未来》而写的诗《画家——赠业余科普作家叶永烈》：

像常青的树叶，
你默默地守护红花，
默默地献出自己。
不要冬天的温暖，
不要夏夜的凉风，
不要生活里的蜂蜜。

你只要：你的时间，
你的小屋，一个科学幻想的原野。
大海上，有一只鹰，
在烟波里，飞去飞回……
那是你，在采撷知识的宝贝。
你谛听：海潮的声音，
你迷恋：奔腾的色彩，
你追寻：浪花的脚迹。
小窗前，你画得如此忘神，
画出一朵朵会说话的花，
夜夜，它和你谈心，谈到月落鸡啼。
呵，你的花儿飞走了，
带着你的梦，
飞到一个遥远的世界里去了。
那里，无土庄稼，一片新绿；
彩色棉花，和云霞比美；
飘行汽车，像轻风吹过大地。……
你的花儿呵，智慧的天使!
它知道：环幕立体电影的秘密；
它知道，机器人一生一世的故事。
它悄悄地飞到孩子们身边，
用图画般的语言
讲述着现代科学的神奇。
呵，多少知识之花，
开遍新长征的雪山草地!
花瓣上的露珠，是你晶莹的汗滴。
未来世界的先知者呵，
未来世界的画家，

请接受我的敬礼!

记得，1979年，当我出差北京的那些日子里，老资格的影人王云缦带着一位青年编剧来见我，商议改编我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位编剧，当时刚进北京电影制片厂不久，尚是新手。后来，他成为名作家。他就是梁晓声。

由梁晓声执笔，我与王云缦参与，我们一起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市》（比《小灵通漫游未来》多了一个“市”字）电影文学剧本，并在1979年第六期《电影创作》杂志上发表。

《小灵通漫游未来市》电影剧本，交到导演谢添手里，谢添极有兴趣，因为谢添拍过儿童幻想片《小铃铛》。但是，看了剧本之后，他为“飘行车”发愁，因为按照那时中国电影的特技水平是拍不出“飘行车”的。未来世界的种种奇迹也使谢添感到棘手，担心拍摄成本太大，承受不了。这样，拍摄《小灵通漫游未来》的计划只好搁浅。

小灵通在未来世界乘坐的“飘行车”，不仅能在地面行驶，而且能够在空中“飘行”。这种“飘行车”，也许会在二十一世纪出现。不过，1996年我看美国电影《第五元素》，却吃惊地发现，这种“飘行车”已经在银幕上“飘”来“飘”去——当然，电影中是用三维电脑动画拍摄出“飘行车”特技镜头，不过这使我十分激动——我二十多年前的科学幻想，起码已经被美国电影导演在银幕上变为现实。

尽管《小灵通漫游未来》未能拍成电影，应中央电视台之邀，由我编剧，拍摄了四十二集儿童电视系列片《小灵通》，在全国播放。

由于《小灵通漫游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小读者们纷纷要求“小灵通”带他们再到未来世界漫游一番。责任编辑沙孝惠也几度敦促我写续篇。

在1984年，我写出“二游”——《小灵通再游未来》；

在2000年，写出“三游”——《小灵通三游未来》。

2000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全本，即包含小灵通“一游”、“二游”、“三游”未来。

2006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又把《小灵通漫游未来》按照“典藏版”和“最新版”出版。

从1961年写出“一游”，到2006年补充、修改并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典藏版和最新版，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1）

“小灵通”手机在中国拥有一亿用户，平均每十三个中国人手中，就有一部小灵通手机。这“小灵通”之名取之于我的科学幻想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

北京的《科学时报》把我评为２００３年度“十大科普新闻人物”之一，记者于佳所写的报道的标题便是《叶永烈：科幻人物成为通讯品牌》：

时下正遍地开花的通信产品“小灵通”与叶永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个字正源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主人公。25年前，他的这本书创下300万册的“天量”，25年后“小灵通”成为一个以常人无法想像的速度一夜蹿红的通讯品牌。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惟一一个科幻人物与市场嫁接的成功案例。虽然叶永烈当初是“无心插柳”。

也就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成都商报》“财经时评”专栏发表记者田宝峰的评论。

25年前，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科幻小说红遍大江南北，创下300万册“纪录”；25年后，一个“小灵通”的话机击中财富盲点，拥有数千万的用户；

一边是著名作家叶永烈，一边是目下正遍地开花的通信产品“小灵通”，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目下愈演愈烈的“小灵通”商标大战，却把“叶永烈”和“小灵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正是他写出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而“小灵通”三个字正是取自这部科幻小说……

面对众多的媒体，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被问及“小灵通”怎么会成为手机的品牌?

事情要从美国的公司———“ＵＴＳｔａｒ．ｃｏｍ”说起。

“ＵＴＳｔａｒ．ｃｏｍ”，现在的正式的中译名叫“ＵＴ斯达康”。其实，“ＵＴＳｔａｒ．ｃｏｍ”是由“ＵＴ”（“Ｕｎｉｔｅｃｈ Ｔｅｌｅｃｏｍ”的简称）和“Ｓｔａｒ．ｃｏｍ”两家公司合并而成。这两家公司的创办人有来自台湾的留美学生，有日本留美学生，还有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美学生。

1995年，日本开始推行“ＰＨＳ”系统手机。“ＰＨＳ”是“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Ｈａｎｄｙｐｈ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的缩写，即“个人手持电话系统”。这种手机能够在日本全国漫游，当时在日本很流行，但是价格相当高。

如果把“ＰＨＳ”系统引入中国，虽然技术先进，但是昂贵的价格显然不适宜于中国市场。聪明的ＵＴ斯达康公司的中国留美学生把“ＰＨＳ”系统加以改造，变成只在一个城市里使用的移动电话，成本就大大下降。

这种只在一个城市里使用的移动电话，叫做“无线市话”，即“ＰＡ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ｃｃ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系统。1996年10月，ＵＴ斯达康开始在浙江余杭进行小范围的推广。

这时候，使他们犯难的是如何向用户说明这种新手机。不论是“ＰＨＳ”还是“ＰＡＳ”，普通用户哪里听得懂？就连“无线市话”，也显得十分拗口。于是，ＵＴ斯达康要给这个新生儿取一个通俗、生动、叫得响的名字。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2）

最初，取名“空中之星”。这名字虽说通俗，却容易使人误以为人造卫星。

后来叫“无线社区本地电话”、“ＰＨＳ手持无线市话”，显然太啰嗦。

又有人提议叫“掌中宝”，这名字有所进步，但是还不能体现这种新手机的特色。

终于有人从《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得到启示，建议叫“小灵通”———又“小”、又“灵”、又“通”，立即获得一致赞同！

于是，ＵＴ斯达康要用“小灵通”注册商标。有人提醒，应该征得《小灵通漫游未来》作者叶永烈的同意。

我接到ＵＴ斯达康的电话，说了声“ＯＫ”。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声“ＯＫ”，后来演变成一亿“小灵通”用户！

后来，我为ＵＴ斯达康公司签署了正式的授权书。

其实，《小灵通漫游未来》跟手机也真有缘：

当今，各种各样的手机公司，都带那么个“通”字，诸如“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全球通”等等，而“小灵通”恰恰有个“通”字；

再说，手机的特点就是“漫游”，而《小灵通漫游未来》恰恰又有“漫游”两字！

当然，更加神奇的是，早在世界上还没有手机之前，写于1961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已经多处写及手机：

“小虎子，你们该下来吃早饭啦。”这时，忽然响起了爷爷的声音。

我前后左右找了一通，却没看见爷爷。

“找爷爷吗？他在我的口袋里喊呢！”小虎子一边笑着说，一边从裤子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似的东西。

“快点下来！”从小盒子里，又传出来爷爷的喊声。

这是一个塑料做的盒子，盒子上有一块火柴盒那么大小的荧光屏。我从荧光屏上看到爷爷一边在看报，一边在讲话呢。

原来，这是一个微型的半导体电视电话机，使人既能听到对方的讲话，还能看到讲话人的动态、表情。

“我这里也有一个。”小燕指了指自己的衣袋说。

“快下去！要不，爷爷等急了。”小虎子说着，就往下跑。

他俩赶紧把香烟盒似的半导体电视电话机拿出来，收听广播。

房间里静悄悄的，时间不声不响地从我们身旁溜走了。我们三个人都各自看自己的书，简直看得入迷了。

“喂，喂，你是小虎子吗？你是小虎子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快回家，快回家，我们等着你吃中饭……”突然，从小虎子的口袋里，传出了讲话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小虎子从口袋里拿出半导体电视电话机，往小小的荧光屏上一看，唷，原来是小虎子的妈妈———杨老师在那里讲话呢！

在《小灵通再游未来》中，就连机器人铁蛋，都有了“袖珍无线电话”———手机：

铁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比香烟盒子还小的方盒，说道：“我随身带着袖珍无线电话。刚才，我躲在我的小房间里，给《未来时报》编辑部挂了电话，作了口头报道。编辑同志当场答复，五分钟之后，‘大作’立即见报。他们还要我不断报道‘著名小记者小灵通’在未来市的活动哩！”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3）

铁蛋呢，拿出袖珍无线电话。

忽然，铁蛋高兴地推搡了我一把，对我说：“刚才，《未来时报》编辑部在电话时告诉我，我写的‘小灵通参观空中少年宫’，已经登出来了！”

《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所写的手机铃声，还是音乐彩铃呢：

这时候，忽然又响起了一阵叮叮当当的音乐声。哦，又来电话啦！

大约正是《小灵通漫游未来》跟手机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小灵通”成了手机的品牌。

不过，ＵＴ斯达康的“小灵通”手机在一开始并不被看好，走过了艰难的发展之路。最初，由于信号不好，“小灵通”手机不灵通。用户用这样的顺口溜讽刺“小灵通”：

手持小灵通，

站在风雨中，

挺胸又别肚，

总是打不通！

“总是打不通”的用户，气愤至极，甚至朝ＵＴ斯达康的工作人员扔鸡蛋！

随着技术的改进，“小灵通”的通信质量得到明显的改进。由于“小灵通”收费低廉，只相当于普通市内固定电话，却又具备移动电话的性能，而且是单向收费，人们称之为“有线话费，无线飞扬”，所以很快就受到中国普通百姓的喜爱。

于是，“小灵通”改行了，从小记者变成手机的品牌。2003年9月22日，新华网浙江频道发出记者余广珠的《“小灵通”本是小记者出身》一文，写道：

“小灵通”是什么？“不就是无线市话嘛！”也许很多人都会如此脱口而出。可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许会知道，“小灵通”其实是记者出身。昨天，“小灵通”之父叶永烈先生来到杭州，向市民讲述了小灵通的离奇身世。

“小灵通”其实早在1961年就出生了，当时的“父亲”就是上海作家叶永烈。可由于生不逢时，《小灵通漫游未来》一书中的主人公小灵通并没有能够及时与读者见面。1978年该书出版后，大眼睛、大耳朵的小记者“小灵通”立即成了当时中小学生热捧的偶像。

“小灵通”也许不会想到，在自己不惑之年还能从记者转行电信。1997年，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在全国首次将日本ＰＨＳ技术应用到杭州的固话网中，诞生了第一代可以移动的市话，而叶永烈笔下的“小灵通”成了这个电信产品的“代言人”。

2003年5月17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王天广的《移动的“固定电话”———小灵通》一文，分析了“小灵通”的“小”、“灵”和“通”三个特点：

“小灵通”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人们的青睐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于其具有“小”、“灵”和“通”三个特点。

“小灵通”的“小”还体现在辐射小和基站小两个方面。“小灵通”手机的辐射率仅为目前一般手机辐射率的３％，“小灵通”基站的发射功率也非常有限，只有５００ＨＷ，而一般的家用微波炉的功率都接近７００ＨＷ，因此，“小灵通”基站的覆盖范围也非常小。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4）

上海人口中的“灵”字意味着方便使用或讨人欢喜，“小灵通”手机恰恰应了我们上海人口中的“灵”字。首先，拨打方便。这是因为它的号码与固定电话相同，不仅容易记忆，更方便拨打，用着顺心；其次，是话费便宜。“小灵通”的资费方式与市话相同，只相当于目前一般手机话费的五分之一，并且实行单向收费；第三，是功能较多。“小灵通”除了具备固定电话的所有功能外，不同的机型还可以支持短信、来电显示，呼叫转移，闹钟等服务。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彩屏的“小灵通”手机出售，使得它的应用更加缤纷多彩。

“通”，顾名思义就是通畅。“小灵通”的“通”也恰恰体现在拥有较高的通话质量方面。“小灵通”的通话频率是“全球通”、“神州行”等普通ＧＳＭ移动通信频率的近５倍。因此，在网络信号覆盖好的区域内，“小灵通”的通话质量远远超过一般手机，可以与固定电话相媲美。

“小灵通”成了香饽饽，用户激增。这时，许多公司争先恐后抢占“小灵通”市场。由于“小灵通”这名字叫得响，他们的“无线市话”手机也用“小灵通”这名字。尽管深圳###一度叫过“市话通”，江苏通信公司则叫“万信通”，但都没有被市场所接受，最后还是叫“小灵通”。这样，中国居然有52家通信公司采用“小灵通”做商标。作为中国最大的“小灵通”生产商的ＵＴ斯达康与另外51家通信公司打起了商标之战！

一时间，这场“小灵通”商标之战打得如火如荼，我也成了“焦点人物”。许多记者打电话给我。我的答复是：“ＵＴ斯达康从《小灵通漫游未来》中采用‘小灵通’作为商标，是经过我的同意的。至于52家通信公司之间的‘小灵通’商标之战，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概不过问，也概不介入。”

这场商标之战不了了之。因为随着“无线市话”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小灵通”的名气已经很大，已经成为“无线市话”的约定俗成的代

名词，就像手机是移动电话的另一个称呼一样。“小灵通”已经从ＵＴ斯达康的商标演变成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业务的名称。

2000年，信息产业部发文宣布：“小灵通”为有线电话网的补充和延伸。至此，无线市话“小灵通”这一名称被###各省分公司正式采用。

这么一来，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都可以把自己推广的无线市话这种业务叫“小灵通”。

这么一来，中国52家通信公司都可以把自己的无线市话叫做“小灵通”。

这么一来，“小灵通”的名气更大了，中国一亿“无线市话”用户都说自己在用“小灵通”。

有兴就有衰。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如今，传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的消息，正是反映了事物的规律。我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扼腕而叹，我也为“小灵通”手机曾经有过的辉煌而自豪。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1）

2006年6月16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应邀出席这届全国书市，并举行签名售书。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出席全国书市了。

在这届全国书市上，我的“主打”新书是《追寻彭加木》。当时，《追寻彭加木》一书是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急件”出版的。从我用E-mail把书稿发给作家出版社，到印出新书，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天！

事情竟是那么的凑巧：新疆全国书市是在6月16日开幕，大会安排我签名售书的时间是在翌日——6月17日上午。6月17日是什么日子呢？正是彭加木的失踪之日！

全国书市本来就是记者云集之处。6月16日那天，我在乌鲁木齐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记者们不断打我的手机，差一点把我的手机打爆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周刊、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甚至还有我的老家的温州日报的记者们，都赶来采访我。6月16日晚，我下榻的宾馆几乎成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幸好，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给我安排的客房带有宽敞的客厅，沙发上坐满了记者。仍有记者摁门铃，那就把一张备用的单人钢丝床也拉来，供记者们坐……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之后，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

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系好安全带，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2）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莫入的禁区。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即通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钱学森秘书柳鸣。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来到搜索现场，是难以完成任务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

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钱学森秘书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上级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乘越野车长途奔驰，进入马兰核基地。我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而隔壁的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原来，他们为了回避记者们的追访，不住乌鲁木齐，而是来到马兰核基地，恰恰被我“一网打尽”！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3）

我在马兰核基地详细采访了彭加木亲属。然后乘军用飞机前往“720基地”军用机场，再从那里乘一架苏制“米-6”直升飞机飞往罗布泊——因为彭加木失踪处罗布泊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漠，没有机场，所以只能乘坐直升飞机飞往那里。

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飞机飞越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据说，十多年前，那里还湖水澹澹，像块蓝宝石。如今，“泊”已名存实亡，不见半滴水，唯见白茫茫的盐碱、鱼鳞般的盐壳。罗布泊看上去是一片米灰色。在这里，寸草不生，连寥若晨星的骆驼刺也无影无踪。

直升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离罗布泊不远的库木库都克。我以为库木库都克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只有一口干枯的井，算是那里的地标！在蒙语中，“库都克”即“井”的意思，“库木库都克”即“沙井”。不过，库木库都克所谓的“井”，只不过是一个两米宽、两三米深的土坑而已！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沙漠来说，有“库都克”——“井”，就能维持生命。彭加木“往东去找水井”，也就是找“库都克”。他是为寻找“库都克”而失踪而献身的。

直升飞机降落时，卷起漫天飞舞的黄沙。我看见一大群绿衣战士冲进“黄旋风”。飞机刚刚停稳，战士们就争着上来卸货了。

时值中午，我刚刚走出机舱，差一点被扑面而来的热浪所掀倒。我的双脚像踩在滚烫的糖炒栗子的锅子里，我的头上是火炉一般的骄阳，我的鼻子吸着热烘烘的空气。

我朝帐篷走去。战士们让我坐在驼毛毡上休息。不料，帐篷里象蒸笼一般，比外边更热，新来乍到的我连气都喘不过来。驼毛毡通常是用来防寒的，而在这热浪滚滚的库木库都克却用来隔热。我和搜索队员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

沙漠里没有水。我曾试着把沙扒开一米来深，也不见半滴水。我们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里喝的水，是用大卡车从“720基地”运来的。水是装在装汽油的那种大铁桶里。汽车在沙海中前进，颠颠簸簸，铁桶在车上左右晃摇，桶里的水成了黄褐色的“酱油”，还带有浓烈的汽油味儿。然而，在库木库都克，只要能够喝到这种水，我也如同饮甘露似的，得到莫大的快慰。用这样的水做饭，那饭也是黄褐色的，而且一口米饭一口沙。

我刚到，搜索队长就向我宣布了纪律：不准用水洗脸，不准用水洗脚、洗衣服。除了饮水之外，水不准他用。因为这里没有水，水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来！就这样，脸脏了，用干毛巾擦擦；脚臭了，光着脚在沙地里走走；衣服脏了，臭了——由它去！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4）

沙漠里是如此炎热：最高地表温度达60℃左右，气温高达50℃左右。我曾把一小段蜡烛放在沙漠上，没一会儿，蜡烛就熔化了。据炊事员告诉我，把鸡蛋放在沙中，一个小时就熟了。这时，我的嘴唇经常感到干硬，脚后跟皮肤皲裂了。水壶，成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甚至在睡觉时也把水壶放在枕边，渴了就得喝几口。很奇怪，尽管喝水量比平时大得多，却很少小便，因为水分大部分透过皮肤蒸发了。

在库木库都克，我随公安人员一起，带着警犬，参加了搜索彭加木行动。在出发搜寻时，我们的打扮十分有趣：头戴白卡其遮阳帽或草帽，胸前交叉背着两个水壶，腰间吊着一袋干粮。尽管暑热逼人，却依旧必须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这里骄阳似火，不穿长袖上衣和长裤，皮肤很快就会被强烈的紫外线伤害。

在广袤无际的沙漠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天上没有一丝云霓。地上没有一寸树荫。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我的头发里、耳朵里、衣袋里，全是细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还采访了许多彭加木的同事以及搜索指挥员……

经过实地采访，当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写出《彭加木传奇》一书，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意想不到，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五行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宣称彭加木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餐馆里！这下子，彭加木变成了“敏感人物”，我的《彭加木传奇》

一书在报审时，有关部门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是“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后来，这本书再三删节，仍无法出版。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准备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这本书在我的书房里“雪藏”了二十六个春秋。已经被人们淡忘的彭加木，由于2006年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经过媒体广泛传播，使彭加木再度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热点人物。

我记起二十六年前写的《彭加木传奇》，进行了大修改，补充了十多万字，写成长篇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一书，

一部“雪藏”了二十六年的书，在新疆全国书市上亮相之后，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5）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我在1961年写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被出版社退稿。“雪藏”了十七个春秋，在1978年出版，一下子就印了三百万册！

这似乎印证了“酒越陈越香”这句话，尽管这样的“雪藏”充满了苦涩与无奈。

查清密探的来历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子。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一拍桌子，立即决定散会。

那幢石库门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那天，代表们按照马林的紧急决定刚刚散去，那个陌生男子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这表明马林当机立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陌生人确实是密探。

翌日，会议转到浙江嘉兴东湖举行。中共“一大”在东湖的游船上顺利闭幕。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查找：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十四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之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据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由于没有详细的线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查清这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

我在创作“红色三部曲”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查清了这一历史谜案。我的查证，得到了许多中###史专家们的认可。

“红色三部曲”总共150万字，是写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红色历程。“红色三部曲”由三部长篇组成，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这套“红色三部曲”在大陆、香港、台湾分别出版，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用三句话，概括“红色三部曲”中三部长篇的主题：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6）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我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程，内中就涉及那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呢?

经过查证，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来华时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正是因为马林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在7月23日晚当马林来到上海“李公馆”出席中共“一大”开幕式，便使“李公馆”引起密探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当7月30日马林再度来到“李公馆”，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密探就突然闯入“李公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1990年暑日，我的长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里。中叔皇问他：“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长子看过我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的手稿，答道：“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长子说及书中描述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情形，中叔皇便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依照中叔皇的提示，1990年8月9日，我前往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家中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7）

薛耕莘先生说起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是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在薛耕莘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送他到比利时读书。薛耕莘颇有语言天赋，在比利时读书精通了中英法三国语言。

在薛耕莘十三岁那年，母亲病重。薛耕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

1930年，二十六岁的薛耕莘参加了法租界工部局的招聘考试，被法租界巡捕房录取，成了一名翻译。凭着过人的聪颖和勤奋，他很快从一名低级翻译晋升为巡捕房的特级督察，并享受外籍待遇。在法租界任职期间，他又在震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薛耕莘周旋于法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既要执行法国总领事的命令，也为国共两党都做了些好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于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曾经帮助过国民党，他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金质胜利奖章。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薛耕莘出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解放后，薛耕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

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在太原遇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

1981年，薛耕莘案获得彻底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

1990年5月起，薛耕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成为上海文史馆终身馆员。

薛耕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国民党政府少将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休干部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度过二十五年艰难的铁窗生涯，却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生活烙下的影子。他非常健谈，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直至我在2007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03岁的他仍健在。他甚至在2006年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

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薛耕莘先生是在1926年才进入法国巡捕房的，他不可能参与1921年搜查“李公馆”事件。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8）

我连忙问起程子卿的情况。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那是1937年“8·13”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挂便衣。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解放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

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1921年前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详况。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薛先生说，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跟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耕莘回忆说，程子卿在法租界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自1931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渡过。

我问及程子卿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解放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

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